

张文江 著

渔人之路和问津者之路

张文江 著

渔人之路和问津者之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渔人之路和问津者之路/张文江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7

ISBN 7-309-04859-8

I. 渔… II. 张… III. 名人-评传-中国 IV. K8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2563 号

渔人之路和问津者之路

张文江 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18853(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孙晶

总编辑 高若海

出品人 贺圣遂

印刷 浙江省临安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9 插页 2

字数 234 千

版次 2006 年 7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4 100

书号 ISBN 7-309-04859-8/B · 244

定价 2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献给我的师友们

目次

曾国藩的学术和人生	1
附：徐光启译《几何原本》的几篇序、跋	32
王国维的学术和人生	36
引子：二十六岁以前(1877—1901)	36
一、哲学与文学(1902—1907)	38
二、文学与史学(1908—1915)	65
三、史学(1916—1927)	90
主要参考资料	119
附：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	120
中国地理大势分析	124
渔人之路和问津者之路——《桃花源记》阐释	134
附：《桃花源记》原文	137
中西象棋异同论	138
《石头记》与《红楼梦》	141
《薄伽梵歌》引介	146
记亡友胡河清先生	149
关于《安提戈涅》	152

读《自题小像》·····	155
鲁迅早年的七篇作品和思想趋向的两次变化·····	158
《呐喊》、《彷徨》的结构分析·····	163
《故事新编》的象数文化结构·····	171
论《坟》和鲁迅作品的格局·····	178
《鲁迅全集》的三次编纂及其意义·····	187
一、第一次编纂(1938年版)·····	187
二、第二次编纂(1958年版)·····	195
三、第三次编纂(1981年版)·····	200
结语·····	204
金庸武侠小说三人谈·····	207
古龙武侠小说三人谈·····	219
梁羽生武侠小说三人谈·····	231
金庸武学说·····	242
《说文解字》析义·····	244
一、不 二、是 三、学 四、孩 五、鬼 六、神 七、哲 八、士 九、世 十、至 十一、贞 十二、易 十三、老 十四、德 十五、棋	
《说文解字》析义(续一)·····	259
一、比 二、念 三、零 四、悟 五、诗	
《说文解字》析义(续二)·····	264
一、譬喻,比喻,metaphor 的字源意义 二、《易》之五断辞解 三、爱的三种写法	
《徐梵澄集》读后·····	269

《玻璃球游戏》感言..... 274

后记..... 278

曾国藩的学术和人生

道光十九年己亥(1839),清王朝自康熙(1662—1722 在位)以后经雍、乾、嘉、道历四帝一百十七年,积衰之势已成。风雨欲来,民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上层尚昏蒙未觉,而有识之士已有深度的危机感。此年,林则徐赴虎门禁烟,北京广东之间,函件频仍。龚自珍(1792—1841)则于北京辞官南归杭州,感时而作《己亥杂诗》,先后成诗三百余首,哀民生,刺暴吏,吁天公,礼《法华》,流露出深深的忧虑,不久竟忧愤以终。这一年,曾国藩二十九岁,居湖南湘乡乡里。正月,乡里痘症大行,其十岁之妹、十五月之子皆染痘殇。四月,曾国藩离家至衡阳,此为曾国藩先世之祖籍,亦为明末清初大学者王船山之故里。六月,至耒阳杜工部祠堂。八月出邵阳,此为当时正活动于外的湖南经世学者魏源之家乡,复入陕西蓝田,十月归。十一月初二,子纪泽生,是日启程北上入京赴职。家人送至长沙,至汉口遇大雪,遂滞留度岁。家事国事天下事,纷纭而来,是岁始记日记,名“过隙影”。感觉时间之流逝变迁,失所怙恃,茫无所归。次年年初入京,己为道光庚子(1840),任翰林院庶吉士小官,乃正式踏入仕途。六月又复患大病,病热危剧,几不救,得朋友守护,八月病势始减。是年七月湘学大师唐鉴(1778—1861)到京任太常寺卿,曾国藩从之讲求为学之方。在唐鉴的熏陶影响下,前后数年之间,曾国藩之学一变,一生之思想

实奠基于此。曾国藩本人自记：

吾乡善化唐先生，三十而志洛闽之学，特立独行，诟讥而不悔。岁庚子，以方伯内召，为太常卿。吾党之士三数人者，日就考德问业，虽以国藩之不才，亦且为义理所熏蒸。（《送唐先生南归序》）

考曾国藩道光十四年二十四岁（1834）入京参加会试，始好昌黎古文，粗知桐城派文章，为其接触文学之始。道光十六年二十六岁（1836）出京还乡，过金陵时贷金购廿三史，为其接触史学之始。而于三十岁（1840）从学唐鉴，于湘学传统中接受程朱理学，乃为其接触哲学之始。唐鉴之生平与为学大概，具见《清史稿·儒林传》，略云：

唐鉴，字镜海，善化人。嘉庆十七年进士。累擢至浙江布政使，调江宁，内召为太常寺卿。海疆事起，严劾琦善、耆英等，直声震天下。潜研性道，宗尚洛、闽诸贤。著《学案小识》，推陆陇其为传道之首，以示宗旨。时蒙古倭仁、湘乡曾国藩、六安吴廷栋、昆明窦埏、何桂珍等皆从鉴考德问业。陋室危坐，精思力践，年七十，斯须必敬。晚岁著《读易小识》，编次《朱子全集》，别为义例，以发紫阳之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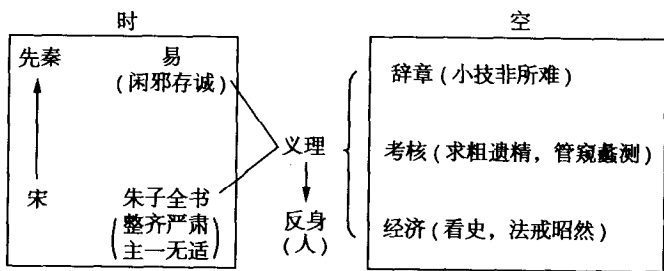
可见唐鉴之思想结构。曾国藩于此内外并困、身心交瘁之际，得遇唐鉴之学，不啻开一新境。早年所从事的各种学问，探得其根，乃判然各归其所。

辛丑（1841）七月曾国藩日记：

至唐镜海先生处。问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先生言：“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时余新买此书，问及。因道：“此书最宜熟读

(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又言:“治经宜专治一经,一经果能通,则诸经可旁及。若遽求兼精,则万不能通一经。”先生自言生平最喜读《易》。又言:“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辞章。考核之事,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事,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至。经济之学,亦在义理之内。”又问经济宜如何审端致力。答曰:“经济不看外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不外乎此。”又言:“近时河南倭良峰(仁)前辈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先生尝教之曰:“不是将此心别借他心来把捉才提醒,便是闲邪存诚。”又言:“检摄于外,只有‘整齐严肃’四字,持守于内,只有‘主一无适’四字。”又言:“诗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诚能用力于义理之学,彼小技亦非所难。”又言:“第一要戒欺,万不可掩着。”云云,听之昭然若发蒙也。

曾国藩所记之语看似散碎,实则唐鉴一生之思想结构,尽发于此。唐鉴为曾国藩分判天下学问,将天下学问归结为义理,将义理归结为反身戒欺,于时间则从《朱子全书》(宋)上出至《易》(先秦)。数语将唐鉴当时所能见到的也是曾国藩所能见到的各种思想,划一轮廓,试挈其纲领如下:



此即曾国藩一生哲学思想变化的基础,也是他一生文学思想变化的基础。对曾国藩一生评价的是是非非,均需溯及于此。唐鉴提出此纲领,非偶然。曾国藩接受此纲领,亦非偶然。此一分判,与当时长江流域之学术背景息息相关。考清代学术萃于长江流域,下游今安徽、江苏两省,尤集一时之盛。康熙、乾隆之际学术变化后,至曾国藩之时,已有汉学、桐城派、常州今文学之异,彼此矛盾已深。汉学精尚考据,远出明末清初之顾炎武,经阎若璩、胡渭至乾嘉大盛,复有惠栋(1697—1758)吴派与戴震(1723—1777)皖派之别,此派观点至乾隆修《四库全书》以扶持之,遂成为清代正统学术。其学集中于东汉一代之经学,上不及西汉先秦,下鄙薄宋学为不足道。方法以语言研究为主,究及一名一物之细,虽对整理古代文献有贡献,终不免知“小学”而不知“大学”之讥。桐城之学,出明末之唐宋派古文,经归有光至清初方苞、刘大櫆,而实创于姚鼐(1732—1815),其时稍后于惠栋、戴震,故其学以义理、辞章、考据分判学问,以考据一门将汉学囊括于内。以为三者不可偏废,必以义理为质,而后辞章有所附,考据有所归,所编集之《古文辞类纂》影响一时。虽然姚鼐已将文学流派上升为哲学流派,其学终以文章为主,弟子所重视亦为其文学成就。常州之学,始于庄存与(1719—1788),至其外孙刘逢禄发挥之,不满汉学之埋头故纸,入而不出,更上溯西汉,以《公羊》之微言大义说《春秋》,有强烈关心政治的倾向。三派纷争对立,龚自珍终未从学其名重天下的外祖父段玉裁,而从学于刘逢禄为常州派弟子,可睹风气之变。嘉庆二十三年(1818),惠氏弟子江藩成《国朝汉学师承记》,常州弟子龚自珍以“十不安”遣书规之,姚鼐弟子方东树更于宋学立场撰写《汉学商兑》三卷(道光丙戌,1826)攻之,此起彼伏。然而除安徽、江苏两省之外,上游更有湖湘之学。

远在宋时,湖湘即有理学家朱熹、张栻讲学其地。明清之际,更有王船山独树一帜。船山之民族思想虽久抑不扬,而岳麓书院传统却延续未绝。道光间,湖南士大夫集团之成员贺长龄、陶澍、唐鉴、魏

源等对政治学术都有一定影响。道光六年至七年(1826—1827)贺长龄延请魏源(1794—1857)编成《皇朝经世文编》，既为时代所需，亦隐然树一与下游汉学对立的标识。贺长龄、陶澍之密友唐鉴入京后著成《学案小识》，更有不满《汉学师承记》之意。二书相辅以观，可见湘学传统中于人于内外两方面之主张。魏源本人与龚自珍同出刘逢禄门下，林则徐任江苏巡抚时与总督陶澍有密切合作关系，又见湘学的经世主义与常州之学的相应处。道光庚子(1840)前后，在京的常州学者风流云散。唐鉴此时到京为一重镇，自然成了新的学术中心。曾国藩早年肄业于岳麓书院，早已受湘学的潜在影响，在此动荡之际接受唐鉴之学，毫不足怪。对照此学术背景，唐鉴所树之义理、辞章、考据、经济四者，辞章括桐城、考据括汉学，经济括常州，而以义理反身归束为湘学内圣之基，均有其实指，已有综合下游诸学问之志。国藩听唐鉴之分判，闻所未闻，早年纷乱之所学，均秩然现其条理，宜其听之昭然若发蒙也。曾国藩遇唐鉴之后，即有信给另一位湘学先辈贺长龄以谈其心情：

国藩以兹内省，早年所为涉览书册，讲求众艺者，何一非欺人之事。所为高谈古今，嚶嚶自许者，何一非欺人之言。中夜以思，汗下如霤。……镜海先生庶几不欺哉。

可见曾国藩对往事的愧悔和重走新路的决心，此心情表现于他所作的《杂诗九首》之中，为曾国藩今所存最早的诗歌之一。录三首如下：

早岁事铅槩，傲兀追前轨。张网挈隙维，登山追岌岌。述作窥韩愈，功名邈侯拟。三公渺如稊，万金晚如屣。肠胃郁千奇，不敢矜爪觜。稍待兰蕙滋，烈芬行可喜。岂期挝驽骀，前驱不逾咫。滔滔大江流，年光激若矢。春秋三十一，顽然亦如此。染丝

不成章，桔迁化为枳。壮盛百无能，老苍真可耻。樽散吾所甘，多是惭毛里。（其一）

霜落万瓦寒，天高月浩浩。美人在何许，相思心如捣。我昔窥美人，对面如蓬岛。神光薄轩墀，朱霞荡初晓。彩凤仪丹青，顾视无凡鸟。意密恩还疏，微诚不敢道。贻我彤管炜，粲兮稀世宝。可怜金屋恩，长门阙秋草。谣诼日以多，靦闵曾不少。宠眷难再得，蛾眉行衰老。区区保私爱，夜夜视苍昊。（其五）

谁能烹雉燕，我愿燎桑薪。谁能钓巨鳌，我愿理其纶。南涧芼萍藻，可以羞鬼神。大才与小辨，相须会有因。嗟余不足役，岂谓时无人。（其九）

诗风苍凉遒劲，曾国藩三十岁前后之所思所感，于此一显。第一首追悔少年之狂态，然不有昔时之野，何有今日之从？“滔滔大江流，年光激若矢”，正是日记“过隙影”所为而作。第二首香草美人，望道未见，有屈骚之情。“我昔窥美人，对面如蓬岛”，正合《诗经·秦风·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之憧憬。夜夜视苍昊者，或能成此洁净之象。第三首回到现实，言世若有大材，自己亦必有小辨之功用，然斯人何在？“嗟余不足役，岂谓世无人”，包含着对时代、对社会、对自己很深的感慨。观诗之遣词用字，可知曾国藩于《诗经》、《楚辞》、汉魏古诗、杜甫所受的影响，亦隐含着他自己选《十八家诗抄》（1852）时的去取标准。

曾国藩得遇唐鉴之学后，即定省身日课：一主敬、二静坐、三早起、四读书不二、五议史、六谨言、七养气、八保身、九日知其所亡、十月无忘其所能、十一作字、十二夜不出门（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在京日记，1842）。录之如下：

一、敬（整齐严肃，无事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二、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体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

四、读书不二(一书不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务外为人)。

五、议史(丙申年购念三史,大人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惮极力为尔弥缝;尔能圈点一遍,则不负我矣。”嗣后每日圈点十叶,间断不孝)。

六、谨言(刻刻留心,第一功夫)。

七、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八、保身(十月廿二奉大人手谕曰: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

九、日知其所亡(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有求深意即是徇人)。

十、月无亡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耽着,最易溺心丧志)。

十一、作字(饭后写字半小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课程。凡事不可待明日,愈积愈难清)。

十二、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此十二条曾国藩守之终身,亦可见他对人生的初步认识。切问近思以实践之,正为理学之要。然而远观全国形势,1839—1842年间,中国正经历着鸦片战争的大动荡,此为清代历史的大转折,也为中国历史的大转折之一。如考察中西长期以来各种情形之消长变化,发生此次冲突,势所必然。清王朝的长期积衰,使战争历程呈现为一系列趋败的偶然之机。道光二十二年七月(1842年8月)终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这对中国各阶层之人均不啻一个巨大的刺激。三月后,曾国藩戒烟。十月日记:

自戒潮烟以来,心神彷徨无主。遏欲之难,类如此矣。不挟破釜沉舟之势,讵有济哉?

戒烟标志着曾国藩 1839—1842 转变期之成。一个人能成为自胜者,始可化有力而为强。

观曾国藩此期内之所思所言,完全受到唐鉴思想强烈影响。唐鉴自言生平最喜读《易》,考其早年著《读易反身录》,入京后又与《学案小识》同著《易庸》,盖主程传之义理者,曾国藩亦步趋之。曾国藩认识唐鉴,即开始读《易》。壬寅(1842)十月,又读《周易折中》(康熙命李光地于 1715 年修成),或一日数卦,或数日一卦。然曾国藩于此,一时实无所得,观其日记,“读某卦不入”,“读某卦无所得”之言,屡屡见之。偶尔或窥见一鳞半爪,亦于日记见之,录数则如下:

《易》大壮卦《象》、《大象》,正与养气章通。(壬寅)

咸恒损益四卦,可合之得虚心实心之法。(壬寅)

巽乎水而上水,颇悟养生家言。(壬寅)

语虽浅露,却为其心得语。将自己所思之理,所见之事出入于《易》书,此自为读《易》之门。于古今易著,每每可见著者之时代与本人之心量,有不可掩者。此年之后,曾国藩于观生、议史、论文之中,亦往往发其读《易》心得,语多不能尽举。绵延至辛亥(1851)前后,已有十年,七月日记云: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颐,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损,君子以惩忿窒欲。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鼎,君子以正位凝命。此六卦《大象》,最切于人。颐以养身养德,鼎以养心养肾,尤为切要。

语虽简，且未必能得易旨，然曾国藩于反身体验得来，自有其价值。寥寥数语，已尝试贯通各卦，由乾坤经损益而至颐鼎，归诸身心两端。此由天地而人，渐具纲领，有一定程度之整体思想。曾氏读书十年，思想有进，方能发为此见。唐鉴于道光丙午（1846）致仕还乡，曾国藩此语出于自得，可作为十年之一小结。曾国藩后来以八境发展桐城派阳刚阴柔之说，其因当出于此。

十年之间，曾国藩之官职亦屡经升迁。由翰林之官七迁而至侍郎，逐步接近政府之枢要地位。至道光末年，六部侍郎先后任其五，阅历大长。其间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任四川正考官，二十五年（1845）任乙巳科会试第二十八房同考官，二十七年（1847）充武会试正总裁，又派殿试读卷大臣，道光三十年（1850）又充庚戌科会试复试阅卷大臣。数年之间，先后参与主持南北地方和中央之考试，使他对当时四方文武人才，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又道光二十五年起充文渊阁直阁校理，每岁之春，例陪同道光帝入阁览《四库全书》，由是得见皇家图书之富，这对他以后编撰《经史百家杂抄》有直接之影响。

辛亥（1851）七月日记又云：

词章之学，吾之从事者二书焉。曰“曾氏读古文钞”，“曾氏读诗钞”。二书皆尚未撰集成帙，然胸中已有成竹矣。

胸有成竹，曾国藩对整体有所了解了。

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帝崩。子继位，改明年为咸丰元年。三月，曾国藩以侍郎上应诏陈言疏，亟提倡讲求人才，同时应诏陈言者有大理寺卿倭仁，所言亦为同一内容（参看《清史稿·倭仁传》），可见当年从学唐鉴者共同之思想倾向。咸丰元年（1851）四月，又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婉谏新帝之病。曾国藩在十年之中，于时位皆不宜言，至此始对国政有所发表。摘录前疏如下：

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但求苟安无过，不肯振作有为，将来一遇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今遽求振作之才，又恐躁竞者因而倖进。臣愚以为欲令有用之才不出范围之中，莫若使令从事于学术，又必皇上以身作则，乃能操转移风化之本。

疏又言：

康熙末年，博学伟才，大半皆圣祖教谕成就之。

鸦片战争前夕，龚自珍有“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己亥杂诗》）之句，今于太平天国革命前夕，曾国藩又提出此类呼吁，均出于敏感于时代者对清王朝衰败气象所怀的忧虑。曾国藩执泥于封建纲常，一生忠于清室一姓之统治，虽为其生活道路所决定，亦其自限，此固不足论。疏中于学术不相应乾嘉而相应于康熙，实有察于康乾以来学术国运的变化而发。期望新皇有重振气象，自是幻想，宜数次上疏，下部议，均格不行。疏虽未能实施，却可见曾国藩本人重视人才的倾向。以后曾国藩幕府集一时之政治、军事、文学、科技人才，原非偶然^①。

其时太平天国革命经洪杨诸领袖之长期酝酿，终于在道光三十年十二月爆发（1851年1月），清廷起用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镇压，林力不支而卒于途。太平天国未能为清廷制于广西绝地之中，遂于咸丰二年七月（1852年8月）突入湖南，攻长沙遇阻未下，年底克武汉三镇，势成，号百万。咸丰三年二月（1853年2月）克南京，继之北伐、西征，清廷大震。太平军入湖南之时，咸丰二年七月，曾国藩闻

^① 据李鼎芳统计，曾国藩自咸丰三年开府衡阳，至同治十一年卒于两江总督之任止，二十年间所延聘之士，可得百人左右。见《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